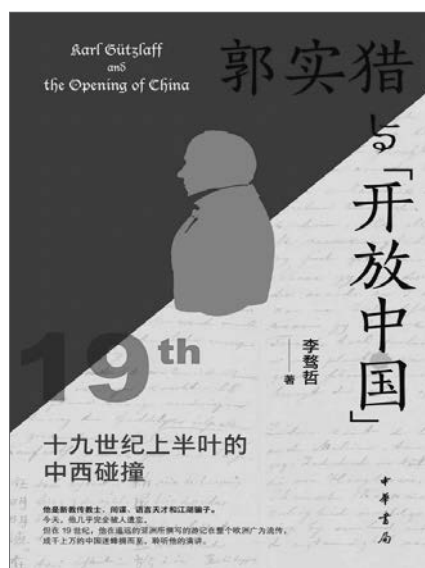


改變近代中英關係的「病夫」 ——評李鷺哲《郭實獵與「開放中國」：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西碰撞》

● 林秋雲

作為改變近代中英關係的重要人物，郭實獵的一生短暫而傳奇。與其複雜身份遙相對應的則是譟譽參半的歷史評價。郭實獵的爭議性為何如此突出？如何理解郭實獵的行事邏輯？



李鷺哲：《郭實獵與「開放中國」：
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西碰撞》
(北京：中華書局，2025)。

作為改變近代中英關係的重要人物，普魯士人郭實獵(Karl Gutzlaff)的一生短暫而傳奇。自二十歲加入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二十三歲獲

得神職前往東南亞傳教，四十八歲在香港去世，他一直在多重的矛盾角色之間遊走——既是新教傳教士、慈善家、醫生、報人、「閩籍華僑」、「中國通」，又是鴉片販子、間諜、「漢奸」、侵華英軍參謀、隨行翻譯、港英政府官員，等等。與其複雜身份遙相對應的則是譟譽參半、趨向兩極的歷史評價：或視其為促進中西交流的使者，或指其為西方殖民擴張的幫兇。郭實獵的爭議性為何如此突出？如何理解郭實獵的行事邏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鷺哲長期致力於人物研究，其新近出版的著作《郭實獵與「開放中國」：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中西碰撞》(引用只註頁碼)由博士論文修訂而成，力圖超越各種標籤，將郭實獵置身於所處的時代語境，通過系統蒐集相關檔案與各類研究資料，重勘史實，還原其作為歷史主體的真實面貌。

全書除緒論、結論、附錄外，正文共分九章，首章從郭實獵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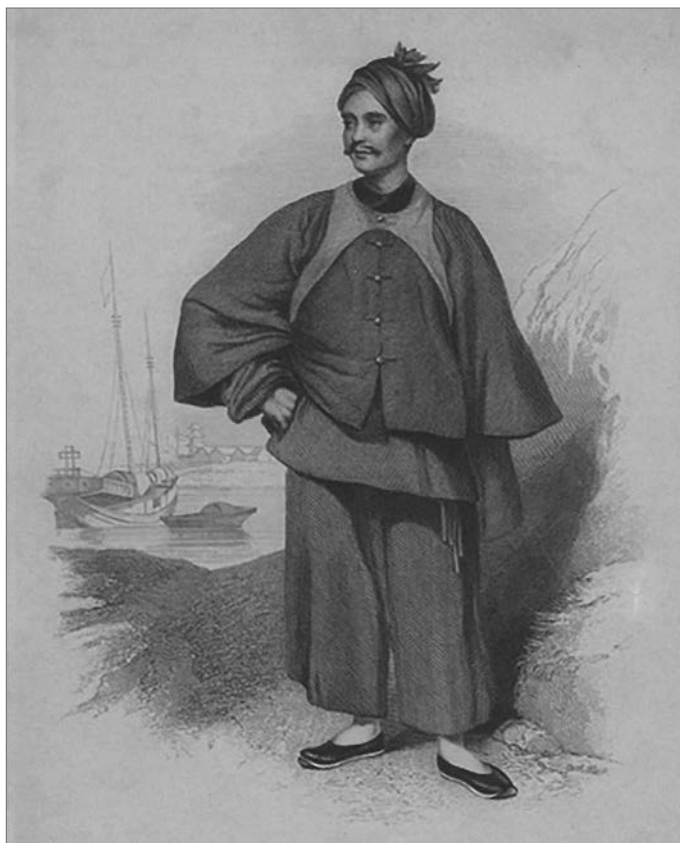
姓名的考證寫起，緊接着折入其童年境遇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格特徵，第三、四章主要對其來華前的傳教經歷進行稽考，第五至七章則通過梳理郭實獵在中國的沿海航行、郭實獵與鴉片戰爭始末，呈現「傳教、商貿與政治」的盤根錯節，第八章聚焦郭實獵在香港創辦的「漢會」（又稱「福漢會」），再探其「醜聞」如何爆發，終章藉圖像資料分析郭實獵形象變遷及背後的塑造意圖。全書寫作既以時間為基本線索（第二至八章），同時又貫穿了不同專題，緊扣郭實獵在西方「開放中國」（頁2）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用展開。無論是重新認識這位謎團般的傳教士、深化對近代早期中外交流的理解，還是重返鴉片戰爭現場、揭示被遮蔽的某些面向，本書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以下擬就本書內容觀點、研究視角與方法、文獻資料的運用等進行簡要評述。

一 心理學的分析方法

初讀本書，印象深刻的是郭實獵早期經歷與病態人格。與更早的「跨文化中間人」、英商小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相比^①，郭氏童年可謂不幸。底層出身，母親早逝，繼母不善，和小斯當東具備良好教養，從小隨父遊歷不同，「逃離」和「抗爭」貫穿郭氏成年以前的人生軌迹——八歲入學即公然指責校長教授的宗教課是「毒藥」；十歲嚮往異域旅行，渴望對抗拿破崙專制；十三歲完成堅信禮（Confirmation）成為基督徒後否認

誓言，棄學逃往異地做學徒卻旋即懊悔，十七歲通過為普魯士國王獻詩重返校園（頁44-47）。這些戲劇性經歷遠超同齡人的尋常遭際。即便回到學校，他仍一如既往：身處培養傳教士的學院卻公開聲稱只想成為牧師；淡漠宗教卻經常前往柏林大學研習波斯語。雖然虔誠奉教的校長一度讓他產生思想掙扎，但自幼缺乏引導的性格難以改變。二十歲那年，他以得到上帝指示為由要求遠行傳教，被送至荷蘭傳道會訓練期間再次抗命，拒絕前往荷屬東印度群島，立誓投身希臘解放事業，遭拒後又以蒐集語言學習資料為由訪問英法，實則希望「繞開荷蘭傳道會，獨自爭取法國福音傳道會和英國聖公會的支持和資助」（頁62）。

全書寫作既以時間為基本線索，同時又貫穿了不同專題，緊扣郭實獵在西方「開放中國」過程中的角色與作用展開。無論是重新認識這位謎團般的傳教士、深化對近代早期中外交流的理解，還是重返鴉片戰爭現場，本書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身着福建水手服飾的郭實獵（資料圖片）

作者借鑒心理學理論，分析郭氏可能患有「自戀型人格障礙」，是童年缺愛引發自卑恐懼所形成的自我保護機制。喪妻讓他再次遭受心理打擊，如果不是妻子難產去世，他不會那麼快踏上駛往中國的商船。

如學者所言，郭實獵個性鮮明，自負傲慢，富有冒險精神，性格複雜且充滿矛盾。魯珍晞(Jessie G. Lutz)亦注意到其童年家庭變故導致日後的人際關係障礙^②，但她更強調以「浪漫主義和虔信主義(Pietismus)的影響來解釋郭實獵矛盾而又奇怪的行為和個性」(頁41)。本書作者則借鑒心理學理論，通過分析郭氏自述及同時代傳教士對郭氏的評價，指出其可能患有「自戀型人格障礙」(頁58)，自命不凡、沉溺幻想、急於求成、渴望被人崇拜等都是病症的具體體現，本質上是童年缺愛引發自卑恐懼所形成的自我保護機制。無論是早年的反叛，還是此後在傳教期間擅自改變傳教傾向與方式，脫離母會成為獨立傳教士遠走暹羅、北上中國探險與傳教，接受東印度公司高薪聘請二度北上調查沿海口岸城市，乃至參與怡和洋行鴉片走私之旅並公開承認，包括後來轉變為戰爭推手、成為遠征軍翻譯、協助英軍在江浙的情報收集與佔領區的民政管理，以及創辦首個中國內地傳道會「漢會」且傳教工作取得超常進展，等等，在作者看來，可以解讀為病態人格作用的結果，「很多事情，似乎都是注定要發生的」(頁66)。

誠如吳義雄所言，對郭實獵的描寫和分析，以性格解釋其言行是本書一大特色(〈序二〉，頁11)。作者在書中第四章對郭氏為何離開暹羅轉赴中國的考察尤為精彩——雖然早已確定以華人為傳教對象，但他深知沒有特殊契機很難深入中國內地，故而暫居華人眾多的暹羅首都曼谷。憑藉醫術打通與上層社

會的關係，郭氏的傳教活動有聲有色，但他的冒進求功注定了不會久駐，開放中國才是夙願。揭示到這一層，「從暹羅到中國」已順理成章，但作者並不滿足於此，而是進一步地讓我們看到歷史的必然與偶然——與妻子李瑪環(Mary Newell)的相遇結識原本有機會改變郭氏的生命軌迹，「她能夠給予郭實獵的愛和包容，不但有助於撫慰郭實獵因為在童年時期遭受後母虐待而遺留下的心理創傷，同時也很可能減輕郭氏由於『自戀型人格障礙』而引起的部分極端表現，從而形成了非常難得和有效的良性心理干預」(頁107)。如果不是妻子難產去世，他不會那麼快踏上駛往中國的商船；喪妻讓他再次遭受心理打擊，且變得瘋狂、極端，甚至將倖存的新生女兒送人寄養。對常人來說，孩子是家庭中生者和逝者的情感紐帶，更有可能成為治癒生者的精神寄託；但對郭氏而言，孩子卻是觸發創傷記憶的開關，他完全無法面對。作者認為，這些反常之舉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的具體表徵，郭氏前往中國不只是為了逃避痛苦，「反倒更像是尋死」(頁109、111)。

運用心理學分析歷史人物最早可以追溯至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上世紀60、70年代，心理學開始被引入歷史研究之中。論者指出，由於心理史學的特點是「把歷史事件都說成是在孩提時代就形成的各種心理變態的綜合表現，是沒有得到滿足的無意識欲望和心願的表達」^③，因而通常被認為缺少科學性。比如，在美國歷史學家弗

蘭茨 (Otto Pflanze) 對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的研究中，同樣可以看到作者強調童年時代遭受的創傷、母親未能給予溫暖和支持，對俾斯麥性格及其政治生涯造成的影響^④。儘管心理史學存在各種缺陷，尤其被詬病為「生搬現代科學的理論去嫁接和解釋歷史人物的心理與行為」，「對情感及其歷史的論述充滿了刺眼的時代誤植」^⑤，但也有論者指出，它「能夠在人們尋找歷史謎團解釋的過程中提供另一種獨特的視角」，「也能在物質和其他客觀條件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對一個事件發展的不同結局提出較為令人信服的解釋」^⑥。

弗蘭茨的俾斯麥傳記因為加入了心理、性格等維度的闡釋而被視為區別於其他俾斯麥傳記的最大特點，他「在描述主人公的個人經歷及其財務狀況、分析他對家人和朋友的態度、考察其宗教信仰與身心健康方面寫得尤為精彩」，展示了「更具人性、作為普通人的、同樣容易犯錯，因此也更容易被人理解」的俾斯麥^⑦。李鵞哲筆下的郭實獵，也正因為有這方面的分析與描述，才得以突破傳統敘事框架，讓讀者覺得有血有肉、親切可感。如果說獲得智慧與勇氣是歷史諸多功能中的重要一環，而這又有賴於歷史書寫中「人」的回歸，重審「人」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⑧，那麼對心理情感的研究將不可或缺，畢竟影響個體行動方式與作出決策的，往往不只是生活中的具體遭遇，而是更為深層隱秘的心理動機、情感狀態與思維慣習，是更為複雜與真實的人性。

二 以郭實獵編織時代

出色的歷史人物研究，不僅要「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⑨，更重要的還在於「以『人物』刻畫『時代』」^⑩。相較施萊特 (Herman Schlyter)、魯珍晞等人的郭實獵研究 (頁 11-14)，本書採用專題式寫作，在性格分析之外，還深入討論了郭實獵中文譯名爭議、其在東南亞的傳教活動、中國沿海航行的經歷、鴉片戰爭中的角色、漢會「醜聞」(下詳)等。如吳義雄所言，「合起來則可以展現郭實獵不平凡的一生」(〈序二〉，頁 10)。身為普魯士人卻受荷蘭傳道會派遣赴東方向馬來人傳教，後又為英國商人、軍隊、政府所用，突破中國海禁。通過解讀郭實獵，其關係到的「一代時局」也得以呈現：背後既有大航海時代以來殖民貿易體系與英帝國勢力擴張的脈絡，亦得益於南中國海周邊地區華人華僑積累的經貿網絡。漢會「醜聞」則折射出傳教士和傳教機構在爭奪利益版圖過程中的複雜博弈 (〈後記〉，頁 312-13)。

除此宏闊的全球史圖景，書中對具體問題的闡發亦富洞見。如譯名從「愛則蠟」至含義更加明確的「獵」之改易：「讓人聯想到一種『放獵逐禽』的意象，將『實獵』倒讀即為『獵實』，似乎又體現了一種爭取實際成就的期望」(頁 23)，以及「歸宗」郭氏、筆名由「愛漢者」到「善德者」，所體現的郭實獵對華策略從爭取華人認同、顯示對中國文化的熱愛，逐漸轉向更為平等、

本書採用專題式寫作，在性格分析之外，還深入討論了郭實獵中文譯名爭議、其在東南亞的傳教活動、中國沿海航行的經歷、鴉片戰爭中的角色、漢會「醜聞」等。通過解讀郭實獵，其關係到的「一代時局」也得以呈現。

郭實獵能夠率先以個人身份進入廣州以外的領地，除了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讓他被視為「福建同鄉」之外，更受惠於中國沿海地區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對東南亞的開放環境、暹羅與中國的海上貿易關係。

甚至帶有教化的姿態；而清代官方文獻中郭氏譯名使用的混亂，既說明當時翻譯人才匱乏，也「反映出清政府不但沒有組織過統一的情報匯總機構，甚至在地方與地方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也缺乏系統的情報溝通」（頁34）。有關傳教士中文譯名的專門研究較為少見，比如艾儒略（Giulio Aleni）、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固然是以其姓氏之中文譯音取名，但「儒」、「禮」、「遜」、「裨」、「文」等漢字的選用，亦不無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主動調適的意味在其中。這種資訊處理能力的鮮明差異，也預示了清廷在鴉片戰爭中的潰敗。

再如，作者發現，作為新教傳教士，郭實獵能夠率先以個人身份進入廣州以外的領地，除了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讓他被視為「福建同鄉」之外，更受惠於中國沿海地區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對東南亞的開放環境、暹羅與中國的海上貿易關係；鴉片戰爭以前「西洋商人還無法前往中國北方的口岸貿易，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北方口岸就是封閉的」（頁119、120）。歷史學家瑞德（Anthony Reid）很早便指出，華人移民是東南亞經濟擴張的主要動力，華人貿易網絡將東南亞商品與中國市場需求緊密對接，乾隆末年與中國異常親密的邦交使得緬甸、暹羅等國家迅速地從十八世紀下半葉的經濟危機中恢復，且得以在英國全球商貿利潤中分一杯羹^⑩。學者普遍注意到，囿於清廷政策，早期傳教士只能將活動基地設在南洋，卻忽略了東南亞與中國的貿易如何為西方繞過廣州體制提供可能。

書中篇幅最重的郭實獵沿海航行與鴉片戰爭則緊緊圍繞「傳教、商貿與政治」展開（第五至七章），生動詮釋了「商人—傳教士組合」如何成為十九世紀以來中西關係的主導^⑪——作為身無分文的獨立傳教士，參與商業調查航行甚至鴉片走私，不但可以獲得不菲收入，還能沿途行醫傳教，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中文秘書的部分動力亦是為了獲得穩定經費。東印度公司、鴉片商等看重的是郭實獵的語言與溝通能力，從「愛漢者」轉向「善德者」的背後，是影響中英貿易和外交關係的主體由東印度公司變為港腳商人的過程，郭氏對華言論也由早期的謙和含蓄、避談政治，轉而強調清軍孱弱、政府腐敗，且反覆將「夷」解釋為「野蠻人」和「魔鬼」，企圖製造衝突（頁135、177）。他雖非將「夷」譯為“barbarian”的首創，卻是使「夷」字譯意發生轉折的關鍵推手^⑫。受鴉片商資助出版的著作《中國沿海三次航行記》（*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與《「阿美士德勳爵」號赴中國北方港口的航行報告》（*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與林賽[Hugh H. Lindsay]合著）為港腳商人贏得了社會輿論和政府高官的支持，改變了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壟斷政策，促成了對華強硬的呼聲（頁137、139、141）；他以商務監督中文秘書身份提交的反映「港腳商人有關中國問題的意見」之調查報告直呈英國議會，更左右了政府的決斷，間接推動了鴉片戰爭的爆發

(頁181)。而在鴉片戰爭期間擔任英軍翻譯，加入遠征軍司令參謀團收集情報，協助管理佔領區，部分是其商務監督中文秘書工作的延續，同時也是他激進的對華政策、「作為港腳商人利益的重要代言人」之立場使然(頁183)。港腳商人與傳教士在開放中國利益上的一致性，使得「傳教士成為西方殖民勢力天然的同路人」^⑭。

翻譯如何影響外交，已有王宏志、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人的研究進行闡釋^⑮，本書同樣揭示了翻譯的重要性。若非具備同時代西人中「獨一無二」的中文口語能力(頁148)，郭實獵難以獲得僑民、沿海居民，乃至被視為民族英雄的關天培之信任。這既有行醫施藥等善舉之功，更因語言作為民族認同的核心要素^⑯，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工具，也為界定個人身份提供了可能^⑰。正是借助閩粵方言及官話，郭氏打破文化隔閡，被視為歸國華僑甚至本地奸細(頁127)，從而使官方放鬆了警惕。如前所述，如果不是妻子的突然病逝促使其臨時北上，那麼他「很可能會缺席1831至1834年中英之間爆發的一系列激烈衝突」，「中英兩國間博弈的節點和節奏，就會因為英方缺乏得力的翻譯和執行人而調整」(頁148)。相較於沈艾娣強調「跨文化中間人」促進知識與資訊溝通，他們的沉默與消失導致中英兩國缺乏對彼此的真實了解，從而不可避免走向戰爭^⑱，本書則呈現了中間人的複雜性：創造相互理解可能性的同時，也增加了博弈的變數。由此或可理解，為何兩國關係緊張之時，中間

人的忠誠備受質疑，「翻譯的危險」亦與日俱增。

三 細密考證呈現人物 複雜性

全書的論述建立在豐富的資料基礎上，其中既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英國外交部的官方檔案，更多則是分散在荷蘭、德國等地的郭實獵未刊檔案及其中西文著作，文獻種類涵蓋調查報告、日記、書信、文集、年譜、地方志、自傳、回憶錄、筆記、小說、報紙、期刊，甚至字典、藏書目錄、信徒資料、告示等，幾乎窮盡一切可用資料，連肖像畫也未遺漏。第九章即是通過分析十一幅郭氏畫像的創作背景、人物環境、服飾表情，畫像的傳播與利用，勾勒其不同階段的事業成就，以及西方公眾對其探險家、中國通等多元形象的接受與認知；虛實之間，也反映了西方對東方的觀感與訴求的變遷過程。儘管許多機構提供線上開放檔案等資源，但為獲得完整的一手資料，作者在海外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仍親赴多國線下查閱。

該課題的挑戰不僅在於資料的搜求，解讀同樣充滿難度。除卻手稿文獻的識讀與辨認，研究者還需要具備卓越的語言能力。作為「語言天才」(頁85)，郭實獵留下來的檔案涉及英語、荷蘭語、漢語、法語等十個語種，儘管二十一世紀的翻譯條件已大大改善，但機器翻譯往往無法捕捉細微的含義，如郭氏在航海報告中提到的“*They were*

除卻手稿文獻的識讀與辨認，研究者還需要具備卓越的語言能力。郭實獵留下來的檔案涉及英語、荷蘭語、漢語、法語等十個語種。作者為了更好地利用學者較少涉足的荷蘭語文獻，專門學習了荷蘭語。

作者基於新材料，對漢會成立時間、成員規模進行重新解讀，並指出漢會「醜聞」既源於郭氏性格引發的同儕衝突，也是傳教士在華利益矛盾激化的結果，轉捩點則是郭氏助手韓山明的「倒戈」。

pleased to call us deceitful and crafty barbarians”（「他們（中國官員）很高興地把我們稱為……詭詐、狡猾的野蠻人」，頁136），僅字面翻譯無法理解“barbarians”一詞有何不妥，實際上，這一譯法極具煽動性並飽含貶義。馬禮遜和東印度公司的譯者一直謹慎地翻譯「夷」字，小斯當東亦批評將「夷」字翻譯為「野蠻人」並不正確。可見本書作者深諳語言翻譯的核心不在技術，而在於對語言背後歷史文化情境的理解，一如他為了更好地利用學者較少涉足的荷蘭語文獻，專門學習了荷蘭語。語言挑戰還包括郭氏熟諳的閩粵方言，尤其是閩南語。如不懂閩南語就難以發現，郭氏將「郭實獵」這三個字讀作“Koet Sit Lap”，既與「德語中郭氏本姓的Gützlaff發音完全吻合，也比較接近閩南語的發音」，「獵」和「蠟」在閩南語中發音相同，是對「蠟」字諧音的繼承（頁22、23）。

郭實獵的爭議性與複雜性不僅為本研究提供了討論空間，也成就了本書選題的價值；依託扎實的文獻，作者也得以更為深入地挖掘郭氏的多重特質——作為渴望建立功業以及解決生計的獨立傳教士，他接受鴉片商的資助且毫不迴避，自1834年底就任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後，卻仍因道德壓力主動中止與東印度公司駐華高級僱員同時也是鴉片販子林賽的合作，不再接受鴉片商的出版資助（頁166-68）；身為英軍僱員、侵略者，英軍佔領寧波期間不但沒有指揮劫掠，反而協助維持軍紀、受理民間訴訟，且英軍甫撤出長江，即在舟山籌建慈善

機構，着手恢復戰後秩序（頁199）。其行為自有英國殖民策略的影響，但未嘗沒有此前在東南亞與華僑相處讓他產生的矛盾情感聯結；他雖屢次偏離傳教士角色，但始終未棄傳教本職，如沿海航行途中廣發宣教冊子、對華人僕役傳教、創立漢會等，這也解釋了漢會「醜聞」對郭氏打擊之重以致不久後病逝——1850年，漢會被在港傳教士與西人聯合調查，被指充滿欺騙、腐敗與罪惡。這一成立於鴉片戰爭爆發之際、活躍於郭實獵1844年返港之後、面向內地的傳教組織，一度發展迅速，在中國至少十二個省份中建立了多達八十個分支機構。

作者的考證功夫從作為補充說明的註腳可窺見一斑，如結合日記內容及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信件，修正部分研究者所謂郭實獵初抵巴達維亞時間為1827年1月6日的說法（頁68-69）；討論郭氏自用之名時，並未迴避漢會成員王元琛呼其為郭士立、港英政府則用郭士笠的分歧，推測漢會成員或因文化水平偏低，僅知其音而未識其字，「士立」/「士笠」粵語發音又與德國原名接近（頁35-36，註釋6）；又如根據郭氏親撰荷蘭語題字辨明《常活之道傳》乃與其妻李瑪環合著（頁106，註釋2）。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可見作者學術之嚴謹。這些「繡花針」式的考證修訂補充了大量史實，推進了專題研究^①。例如，關於郭氏為何東來，通過細究與馬禮遜等人首次相遇的時間，推翻了受馬禮遜影響的舊說，認為其赴東印度群島實迫於荷蘭人壓力，轉向華人傳教則與在爪哇島結識麥都思

有關(頁64-66、71-79)；又如基於新材料，對漢會成立時間、成員規模進行重新解讀，並指出漢會「醜聞」既源於郭氏性格引發的同儕衝突，也是傳教士在華利益矛盾激化的結果，轉捩點則是郭氏助手韓山明(Theodore Hamberg)的「倒戈」，指責郭氏「對漢會真實情況故意默不作聲，並且散播令人震驚的謊言」(頁222)。儘管二人傳教理念存在差異，但韓氏從未否認漢會成就，導致兩人決裂的並非外部調查壓力，而是郭氏基於自身偏執性格針對韓氏的猛烈批判和攻擊，「打垮漢會的根本原因，與其說是韓山明的報告，倒不如說是郭實獵與理雅各、韓山明往復不休的論爭」(頁223)。

郭實獵若干隱微行迹亦藉作者的細密考證得以昭顯，如其學習漢語的方法，既有研究鮮有注意到郭氏求學柏林時校長傳授的口語習得法，即與精通外語者交談，異於其他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注重書面語的早期來華傳教士。更獨特的是郭氏的練習對象——民丹島傳教時收容救助的華人麻風病患者(頁85-86)。十九世紀歐洲人對麻風病的傳染性認知尚不確定^②，然時人對此病仍多避之不及，唯郭氏不但沒有恐懼和逃離，反而整天陪伴病患者，讓他們用方言與自己交談，開展慈善事業的同時藉機提升口語能力。且不論其救助弱勢群體的動機是否有騙取差會經費的嫌疑，此舉已展現他非凡的勇氣；無論是否抱有對亞洲民族的歧視或「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觀點」(頁87)，他的做法很像中世紀基督教聖徒——通過照顧身患惡疾的病人吸引信徒和弟子，證明自己經受

得住信仰的嚴峻考驗^②。當然，這其中也不排除有他病態人格的作用。

本書並非以評價郭實獵為旨歸，而在於為其評價提供客觀史實基礎，這也體現在對以郭氏英文名命名的地標、機構的求索，以及其人物形象在中文世界變動的考察上——香港中環“Gutzlaff Street”的命名與郭氏對港英政府的貢獻有關，從「郭士笠街」到「吉士笠街」的變化，表明其在華影響力隨去世迅速消退(頁35-36)，二十世紀20、30年代因學術研究需要被重提時，郭氏的中國通身份及其推動鴉片走私最先受到關注；至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寫就，郭氏形象出現分水嶺，「逐漸成為了間諜、強盜與鴉片販子的代名詞，由於直接參與過侵華戰爭，郭實獵的形象迅速地惡化，從『飽受爭議』的人物徹底地變成了『反面人物』」(頁38)。在西方則不然，從位於上海與嵎泗列島之間的“Gutzlaff Island”到上海外灘信號塔的英文名稱“The Gutzlaff Signal Tower”以及上海體仁醫院“Gutzlaff Hospital”，可見其飽受爭議的同時，功績和慈善事業仍被西人銘記(頁36-38)。如作者所言，「很難用簡單的語言概括郭實獵複雜的一生——一個被大時代成就的風雲人物，一個極端矛盾的複合體」(頁259)。

四 研究貢獻與相關問題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研究方法，還是在史料的發掘與運用、史實的復原、對事件的闡釋，包括行文等方面，本書都具有值得借鑒的

本書並非以評價郭實獵為旨歸，而在於為其評價提供客觀史實基礎，這也體現在對以郭氏英文名命名的地標、機構的求索，以及其人物形象在中文世界變動的考察上。

作為中文世界第一部郭實獵研究專著，本書深化、拓展了郭實獵的相關研究，通過重建郭氏的經歷與事業，生動地呈現小人物與宏大的歷史進程之間的關係，打開了理解中英兩國通往鴉片戰爭的別樣之路。

意義。作為中文世界第一部郭實獵研究專著，本書深化、拓展了郭實獵的相關研究，通過重建郭氏的經歷與事業，生動地呈現小人物與宏大的歷史進程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打開了理解中英兩國通往鴉片戰爭的別樣之路。至於本書的缺憾，吳義雄已有所揭櫫，即郭氏去世前擔任港英政府中文秘書，該職務「是港英官方的重要角色。對於這個方面，有關研究一向很少，本書亦未予梳理和論述」；此外，對郭氏留下的眾多作品亦缺少深入分析（〈序二〉，頁12）。

首先，與此相關的問題是，擔任港英政府中文秘書，與漢會的快速發展，以及漢會被質疑、攻擊之間是否存在關聯？畢竟這兩件事在時間上高度重合，而近代來華傳教士的世俗成就又與其教界聲望密切相關。近代來華傳教士大都將活動範圍擴展至世俗領域，圍繞着「向中國人傳教」這個中心進行，「他們開闢的所有活動領域，都是其宗教目的在邏輯上的展開。因此，他們在這些領域的成就，同時也被當作在廣義上的傳教事業上所取得的成就」^②，與其享有的聲望和地位密切相關。一方面，在清廷尚未將傳教活動合法化的前提下，漢會成員能夠深入內地，且迅速建立眾多分支機構；而漢會在歐洲受到廣泛認可，爭取到眾多傳教組織以及普魯士國王的資助，固然離不開郭氏撰寫文章、大造輿論，使人們相信他的傳教事業正在取得快速發展，但也不排除在殖民政府擔任公職為他帶來信譽擔保，因而贏得歐洲社會信任。另一方面，殖民當局官員身份大概是同時代傳教士世俗成就的

頂峰，為郭氏帶來地位和榮譽的同時，終難避免使漢會成為眾矢之的。

其次，郭氏有關中國的著述多達數十種，這些言論背後固然涉及到英國的貿易主體，但從知識社會史的角度來審視這些著述，是否會得出其他新的認知？具體說來，郭氏著述中充斥的大量對清政府的批評，除了為港腳商人利益代言的立場之外，有否受到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成員寫作的中國旅行記，或是郭氏之前來華傳教士的影響？

郭實獵自述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宗旨時，曾提到中國人停滯不前卻盲目自負^③。而據筆者考察，這一說法早在馬戛爾尼使團隨行人員巴羅（John Barrow）的《中國旅行記》（*Travels in China*）中就已經出現，他在稱讚「中國人是一個世上現存的、率先達到一定完美高度的民族」後話鋒一轉，批評道：「因政府的策略，或者某些其他因素，他們停滯不前。兩千多年前，相對而言，當全歐洲仍處於野蠻的時代，他們已經具有與現在同等水平的文明，但從此後他們沒有絲毫進步，許多方面卻在後退。」^④關於清政府官員的腐敗，巴羅也毫不客氣地直言：「當權者貪婪的唯一障礙是害怕被察覺而受影響，所以當官的都不要面子，不怕丟臉，沒有公道感」^⑤，抨擊清廷的總體特點就如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所說，是「表面殷勤和暗裏懷疑、假文明和真粗俗、偽善和實惡的奇妙結合。朝廷各部莫不如此」^⑥。巴羅對於中國軍隊和武器同樣沒有絲毫讚美：「中國戰士執大而圓的藤盾和工藝不精的大刀……看上去他

們能夠很快進行衝鋒。事實上，騎兵的真正速度是相當緩慢的。……他們的炮非常少，質量極差。……中國缺少上好鋼鐵製造的槍機，而且火藥質量差，但最主要的是他們缺乏士氣和頭腦……」^②由此可見，郭實獵的相關言論並非首創。

本書作者也對比了郭氏著述與馬戛爾尼及阿美士德使團 (Amherst Embassy) 副使艾理斯 (Henry Ellis) 的遊記，指出與「極力將中國沿海官員和駐軍描繪得腐敗、軟弱、不堪一擊」的郭實獵相比 (頁131)，他們的遊記「很少能找到對清政府官員刻意貶低的記錄」 (頁132)。但無論是馬戛爾尼還是艾理斯，他們的外交身份都更為正式，記錄中國之行的態度肯定要比使團其他成員要更為克制謹慎。巴羅自敘寫作緣起，也說「還有許多有趣的題目，因其著作的性質，喬治爵士〔馬戛爾尼〕僅能觸及，另一些則不在他的寫作計劃內。他的目的是要說明使團的觀點，並且表示能做到的事已經做到，藉此促進英民族的利益，維護英人的尊嚴」，他寫作此書要在「剝掉天朝華而不實的外衣，揭開傳教士書裏掩蓋的朝廷偽裝」^③。周寧的研究也指出，這次出使令英國政府感到尷尬，作為大使的馬戛爾尼出言非常謹慎，在其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有限文字中，盡量保持中立客觀^④。鑒於巴羅的優美文詞和沒有顧忌的自由表達，其書在歐洲廣受歡迎，1804年在倫敦出版之後很快再版^⑤，並迅速被翻譯成法文、德文、荷蘭文，影響力遠超馬戛爾尼、斯當東父子等人，郭實獵讀到他的書並非沒有可能。由此延

伸的另一個問題是，郭氏有關中國著述及翻譯的具體受眾，除了利益相關的商人和政客外，是否還有其他群體？如果放在漢學史的脈絡下考察，是否會看到另一個不一樣的郭實獵？

此外，作者認為，郭實獵在其撰寫的中文章回體小說《贖罪之道傳》中將女主角取名「林瑪環」，故事中瑪環嫁給了「吳正帖」，「閩南語中『郭』、『吳』二字發音接近，郭氏很可能也是在借『吳正帖』以自況。這部小說可以從側面印證郭實獵和李瑪環親密無間的夫妻感情」 (頁104)。需要稍做糾正的是，在閩南語中，「郭」和「吳」發音存在差異，「郭」的音讀是“kueh”，聲調屬入聲；「吳」的音讀是“ngôo”，聲調屬陽平聲。不過，閩南語發音複雜，不僅存在文白異讀，甚至同樣講閩南語的地區內部也會產生差異，加上東南亞地區語言環境的影響，閩南語與當地語言長期接觸，某些發音在特定語境下產生混淆或趨同也不是沒有可能，但需要進一步的證據支撐。

郭氏有關中國著述及翻譯的具體受眾，除了利益相關的商人和政客外，是否還有其他群體？如果放在漢學史的脈絡下考察，是否會看到另一個不一樣的郭實獵？

註釋

① 游博清、黃一農：〈天朝與遠人——小斯當東與中英關係 (1793-18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 (2010年9月)，頁6。

②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8), 18-19.

③ 參見田汝康、金重遠選編：《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302。

④ Ott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3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趙涵：〈當代西方情感史學的由來與理論建構〉，《史學理論研究》，2020年第3期，頁138。

⑥ 陳曉律：〈新思潮與史學出「新」的尺度——兼論20世紀的西方史學流派〉，《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5期，頁139。

⑦ Theodore S. Hamerow, "A More Human Bismarck", *The Review of Politics* 53, no. 4 (1991): 741-44.

⑧ 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論20世紀史學中「非個人性歷史力量」〉，載《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353-92。

⑨ 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載《南遊雜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205。

⑩ 戴海斌：〈自序〉，載《晚清人物叢考（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18），頁2。

⑪ 瑞德（Anthony Reid）：〈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初期華人貿易與東南亞經濟擴張之概觀〉，載李慶新主編：《海洋史研究》，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61-75。

⑫ 吳義雄：〈貿易擴展與19世紀前期中西文化交流〉，《世界歷史》，2024年第6期，頁4-6。

⑬ 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從近代中西衝突看現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56-57。

⑭⑮⑯ 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頁248；517；414。

⑰ 詳見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

（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3）；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趙妍杰譯：《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4）。

⑱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⑲ 王東杰：《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頁1。

⑳ 沈艾娣：《翻譯的危險》。

㉑ 本書除第七章外，其他章節分別發表於《近代史研究》、《漢學研究》、《道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基督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清史研究》等中國大陸和港台重要學術刊物，這也是對作者研究工作創新性的有力說明。

㉒⑳ 梁其姿著，朱慧穎譯：《麻風：一種疾病的醫療社會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168；87。

㉓㉔㉕㉖㉗ 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巴羅（John Barrow）著，何高濟、何毓寧譯：《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頁331；216；223；358-60；112-13。

㉘ 周寧：《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309-11。

㉙ John Barrow, *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g to Canton*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4); *Travels in China*, 2d ed.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6).